

毛劉兩派在教育路線上的分歧

汪學文

一 前言

五十五年八月，匪黨中央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即會指出：「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

五十六年七月，匪報則強調：爲了完成上項「任務」，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必須對劉少奇派推行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進行澈底的批判。據謂：自共匪竊據大陸以來，教育戰線同政治戰線、經濟戰線一樣，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尖銳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毛澤東制定了一條「革命的社會主義教育路線」，而劉少奇却推行一條「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彼此針鋒相對。前一條要爲捍衛「無產階級專政」服務，後一條要爲「資本主義復辟」效勞。前一條要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後一條要爲「地主、資產階級傳宗接代。」因此，匪報認爲：開展教育大批判，是教育戰線上兩個階級的大搏鬥，兩條路線的大決戰；是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劉少奇派澈底批深、批透、鬥倒、鬥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註一)

由上可知，所謂「教育大批判」，顯然是從政治立場和政治觀點爲出發點，並作爲權力鬥爭的一環。事實上，毛劉兩派在教育路線上是有矛盾、有分歧的，但是，這種矛盾與分歧，必須從教育方針、政策、制度、教法，以及若干實際問題中去作比較分析，才能瞭解真相；也唯有如此，才能瞭解「教育大批判」的實質、趨向、以及效果。

二 教育思想的分歧

毛劉兩派在教育路線上的分歧，其根本原因是由於教育思想有分歧，特別是思想基礎彼此不同。

毛派認爲：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是馬列主義的重心，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因此，在所謂社會主義社會是承認還是不承認階級鬥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是當代馬列主義同一切修正主義鬥爭的焦點，也是共匪兩條根本對立的教育路線的鬥爭焦點。由於這兩種思想的根本對立，而構成了教育戰線上一系列問題的根本對立。(註二)

在階級和階級鬥爭方面，毛匪澤東曾經指出：「整個過渡時期存在着階級矛盾、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鬥爭。」「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從這個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毛匪不僅視教育爲階級鬥爭的工具，而且強調教育要緊密地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服務。

爲了加強階級鬥爭，毛匪一再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並指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羣衆鬥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鍊中成長的。」基於這一觀點，毛派又提出「從游泳中學會游泳，在鬥爭中學會鬥爭」的口號，把「階級鬥爭」作爲青年一代的主課。

但是，劉匪少奇却認爲在所謂「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他於四十六年在匪黨上海市黨員幹部大會上會指出：「國內敵人已經基本上被消滅了」，「國內主要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主要矛盾已經解決了」。「現在那個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了，那些事情用不着了，那些經驗閑起來了」，「現在是大家搞經濟建設，經濟建設是中心」。他在匪共青團一屆三中全會上又說

：「我們要大量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是爲了發展生產，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基於這種論點，劉匪少奇曾多次對學生說：「你們學習的任務是建設，是使國家工業化，克服中國的落後現象。」因此，毛派指責劉匪把社會主義教育的階級性抽掉了，把「教育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的本質否定了，而認爲教育是和平建設的工具，教育的任務完全是爲了傳授知識和學習技術；並指他的教育路線的思想基礎是「階級鬥爭熄滅論」。(註三)

同時，毛派並指劉匪之所以持「階級鬥爭熄滅論」，係基於蘇俄黑魯曉夫的觀點。黑魯曉夫曾說：「我們的社會正在爲提高勞動生產率 and 解決蘇聯的基本經濟任務而奮鬥」，「列寧提出的誰戰勝誰的問題，在我國已經以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得到了解決」，「鬥爭從純思想的領域轉移到物質生產領域」。爲此，「學校的使命是培養既掌握科學基本知識又能經常進行體力勞動的受過全面教育的人；培養青年力圖成爲對社會有用的人，渴望積極參加生產社會所必需的財富。」毛派認爲「中國的黑魯曉夫」(指劉匪少奇)與「蘇聯的黑魯曉夫」的言論是「前呼後應、此唱彼和」的。(註四)其實，劉匪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論」，主要的是基於他自己對「階級」的分析和體認，他所說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主要矛盾已經解決了」，實際上就是意味着在大陸上資產階級的財產既被沒收，這個階級已不復存在，例如他曾說：「聘請就是雇用，大學教授才掙幾百斤米，是無產階級。」(註五)被毛派指爲「中南地區的黑魯曉夫」的陶匪鑄，也有類似的看法，他於五十年十月在「中南區高級知識份子座談會」上會說：「我們不能老講人家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人家經過了考驗，有了進步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就是國家的知識份子，民族的知識份子，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份子」；「我建議：今後中南地區一般地不要用『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個名詞了。」在這次會上，陶匪鑄更會坦白地指出：「國家這麼窮，人口天天增加，軍隊還是要，學校不能不辦，我們共產黨員家裏沒有錢，老百姓也沒有錢，地主搞完了，資本家的產也共了，那麼怎麼辦？就是靠發展生產。」「現在我們不能共產，就是沒有產可共。」(註六)這就是說大家都變成「無產階級」了，「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了。

由上可知，毛劉兩派在教育思想上的分歧，是由於對階級問題的看法不同，劉派係以經濟爲出發點，認爲財產既已沒收，大家都是「無產階級」，

毛劉兩派在教育路線上的分歧

因而強調以建設爲學習的主要任務；毛派則以思想爲出發點，認爲資產階級的財產雖已沒收，但是思想却沒有沒收，也無法沒收，他們「人還在，心未死」，隨時有「復辟」的可能，因而強調思想的改造與革命化，並且強調不能忘記「階級鬥爭」。

三 教育方針的分歧

共匪在教育方針的問題上，會有過長期的爭論。在四十七年四月和六月匪黨中央召開的教育工作會議上，始正式決定：「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爲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必須由共產黨領導。」(註七)

據說這個教育方針，是由毛匪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其內容實際上包括三部份，即「教育爲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教育必須由黨來領導」；毛劉兩派在這三部份的實踐上，都有着明顯的分歧：

在「教育爲政治服務」方面，毛派不僅規定在一切學校中，必須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並且強調要以毛澤東思想武裝青年，突出政治必須落實到青年的思想革命化。林彪在匪軍內提倡的「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學習毛澤東著作」，以及「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等要求和方法，也要適用於學校。毛派這種措施，顯然是要以毛澤東著作取代馬列主義，用毛澤東思想代替所謂無產階級政治。

劉派則認爲「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政治不能代替業務」、「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能治病」。(註八)例如前僞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在「文科教材會議」上會說：「對大學生在政治方面要求過高，必然會影響專業學習，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也是不切實際、做不到的。」他在「中等藝術教學方案會議」上又指出：「政治課主要是講政治常識。思想改造要靠平常的生活中長期地潛移默化。」(註九)前僞文化部長陸定一，認爲教育就是「傳授知識、學習知識」，學生的「正業」就是「好好讀書」，學校各項工作安排要「以教學爲主」，而思想政治工作應該「保證學校的教學工作和其他各項工作的完成」，因此在他的影響下，僞「北京景山學校」的「黨支部」中

，設有語文委員、數學委員、化學委員、外語委員等，而不設負責思想政治工作的宣傳委員和組織委員。他說：「對小孩子講三面紅旗，講共產主義思想教育，講馬列主義教育，很困難」；「英雄模範人物搞得太多了，像二十四孝一樣，不知道學哪一孝好」；他並特別指出：以毛澤東思想武裝青年會使青年「思想僵化」；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是「庸俗化」、「簡單化」、「形式主義」、「實用主義」；學生參加政治運動會破壞學校的「正常秩序」，「學校要有秩序，沒有不行。」（註一〇）此外，前匪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則謂：毛澤東著作「還未經考驗」，是「生動的不準確，準確的不生動」，不能算作「範文」。（註一一）總之，毛澤東思想和著作的水平既不高，而對正常的教學工作又有嚴重的影響，因而劉派提出「解放軍的經驗不適用於學校」、「語錄進課堂對教師有壓力」等口號，以資抵制。

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方面，毛曾於四十六年二月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詞中，即提倡「勤儉建國」，指出「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全靠青年和全體人民「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四十七年八月，毛曾視察僑天津大學時說：學校是工廠，工廠也是學校，農業合作社也是學校；不僅學生要搞勤工儉學，教師也要搞。當時天津大學的師生即自己蓋樓房、蓋工廠，並已開辦了一百三十多個工廠和車間。（註一二）同年九月，共匪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乃規定在一切學校中，必須把生產勞動列為正式課程。每個學生必須參加一定時間的勞動。學校要辦工廠和農場，並注意與教學相結合，也要協助工廠和農業合作社開辦學校。學生可以在學校自辦的工廠和農場中勞動，也可以到校外的工廠和農業合作社去參加勞動。當年僑西北工業大學就有八個教研組與五個農業社和二十七個工廠企業建立了初步聯繫；到五十三年三月，北平地區各匪僑高等學校，計在郊區的十三個農場，若干公社及工廠礦山，建立學生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的固定基地。足見生產勞動在各級學校中，其重要性與份量，已超過了一般學科，並影響了一般學科的教學。

劉派對於生產勞動並不忽視，但是他們的着重點是學習技術，從事建設，「使國家工業化，克服中國的落後現象」；認為學校、特別是高等學校，應該講授專門知識、專門技術，培養實際工作幹部，而不宜把學生當作「普通勞動者」來使用，更不可把「普通勞動者」作為培養的目標。因此主張生

產勞動以不妨礙一般學科之教學、不影響系統基礎理論之訓練為原則，學生每年平均不得超過一個月，教師則以半個月為限，均不必下廠下鄉。至於特殊專業方面，認為「彈鋼琴的不參加勞動比較好」、「醫學院的學生下鄉給老百姓看病就很好，不一定參加勞動。」（註一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派會指責陸平反對生產勞動，把僑北京大學的工廠「一個一個地砍掉，最後連一個像樣子的工廠也沒有了。」陸平的理由是工廠辦得太多了，使得他不知道自己是在當「校長」還是在當「廠長」，所以不得不閉關若干，以免影響一般教學。

從上述的事實中，我們知道毛劉兩派關於「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分歧，在量的方面是多與少之爭，在質的方面是普通工與技術工之別，而非贊成生產勞動與否的爭執，似無根本的矛盾存在。

在「教育必須由黨來領導」方面，毛曾視察僑天津大學時特別指出：高等學校應抓住三個東西，第一就是黨委領導，其次是羣衆路線，第三是把教育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註一四）毛派並認為教育工作者不僅在政治上應該接受黨的領導，而且在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業務等方面也應該接受黨的領導，才能不落後於時代，才能少犯錯誤和不犯錯誤。（註一五）劉匪少奇在「階級鬥爭熄滅」的論據下，認為「黨的主要任務，就是盡快地發展生產力」，而在教育領域裏，主張採取「校長責任制」，「開開會，發現幹部，總結經驗，這就是體現黨的領導。」（註一六）這就是說：「政治上由黨領導，業務上由專家領導」，黨委不必過份地控制；如果「空談革命」、「繼續這樣搞下去」，「黨就要跌下台」；因為「技術，黨不能領導」，「黨同政府管理宣傳文教工作的黨員幹部，沒有知識文化不行」，「小知識份子領導大知識份子，無論如何是不行的，他不行的。」由於毛派的嚴密控制已經發生不良影響，劉派乃更進一步提出學校「非要國共合作不可，非要同資產階級合作不可」的主張，認為「資產階級是中國最有知識的階級」，「離開資產階級還有誰來教我們」？同時還提倡「三三制」的領導體制，就是在行政領導成員中，無產階級知識份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左派和中派，各占三分之一。（註一七）

毛派指「三三制」的目的是「取銷黨的領導」，「實行階級投降主義」，其實所謂「三三制」只是一種統戰手段而已，劉派未嘗不企圖透過「三三

制」，逐漸以劉家黨取代毛家黨。因此，我們可以說，毛劉兩派在教育工作的領導上，早已展開權力鬥爭。

在匪黨教育方針正式制定之前，毛酋于四十六年二月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詞中說：「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爲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直到現在，毛派對於這兩個教育方針仍然相提並論，對於後一個教育方針，劉派顯然有不同的意見，例如劉匪少奇會說：「埋頭讀書，埋頭從事理論研究」是學生的「主要工作」，「不能叫他做學院派」；學習的任務是「建設」，因此「業務第一、智育第一」。林匪默涵則認爲「除了德育、智育、體育之外，還要加一個美育」；「美育是國民教育中的一個重要方面。美育對培養人的性格、品質和情操都很有影響；美育可以啓發學生的智慧，培養學生感受生活，感受藝術和鑒別藝術的能力。」（註一八）這些論調一方面意味着毛酋的教育方針不够完備，另一方面則認爲匪黨既已制定了教育方針，毛酋的教育方針已經沒有再提的必要。

四 教育政策的分歧

共匪的教育政策，主要的有二：一爲教育對象上的階級教育，一爲教育內容上的紅專教育。

在階級教育方面，毛酋認爲「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教育亦有階級性，因此，共產主義教育應以培養無產階級爲對象，以工農份子爲主體。劉派則主張在招生工作中要「一視同仁」，在升級制度上要以學業成績爲準，功課跟不上的就留級或退學，因此，僑山東醫學院於五十一年勒令一百一十一名學生退學，其中貧下中農子女佔百分之八十四，匪黨團員佔百分之六十六。（註一九）毛派指責劉派這種主張和措施是美國「教育卽生活」、蘇俄「全民教育」、和孔子「有教無類」等理論的翻版（註二〇），完全抹煞教育的階級性。其實劉派的主張也是具有階級性的，所不同的是他們認爲在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中大家都是無產階級，因而可以「一視同仁」。

在紅專教育方面，共匪的政策始終搖擺不定，四十七年提出「又紅又專

毛劉兩派在教育路線上的分歧

」口號時，目的是加強「政治教育」，使其與「專業教育」相結合；後來匪俄分裂，蘇俄撤退科技人員，使共匪的建設工作幾乎陷于停頓，於是自五十年起不得不趕快加強「專業教育」，培養科技人才。到了五十三年，由於青年學生中的「自然紅」論調和「三過」思想極爲普遍，共匪又改變政策，強調青年學生的思想要革命化，要走「又紅又專」的道路。同時，「紅」與「專」之間，始終存在着若干矛盾：第一是「兼顧的矛盾」，有人認爲時間是常數，要「紅」就沒有時間去「專」，要「專」就沒有時間去「紅」，「紅專二者不可兼得」；第二是「輕重的矛盾」，有的「重紅輕專」，有的「輕紅重專」；第三是「先後的矛盾」，有的主張「先專後紅」，有的主張「先紅後專」。由於「紅專教育」的政策搖擺不定，而且還存在着難以調和的矛盾，因而毛劉兩派在這個問題上也各有所偏，發生分歧：毛派雖高唱「又紅又專」的口號，但其真正的目的却是着重于「紅」，主張「以紅爲主，以紅帶專」，「以政治統帥業務」，以便控制青年知識份子的思想，免得他們「因爲書讀得越多，業務專得越精，對勞動人民的危害也越大。」而劉派則重視「專業教育」，主張「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並且認爲「又紅又專」的目標是不切實際的，如果硬性做去，將是每一樣都學不好，影響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

五 教育目的的分歧

毛酋一向主張教育以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爲目的；五十五年五月七日，毛酋又強調要「把各行各業都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的大學校」，「無論是解放軍指戰員、工人、農民、學生，還是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都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都要批判資產階級，都要以本業爲主，兼做別樣，都要培養成爲具有無產階級政治覺悟的，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新人。」簡單地說，毛酋主張教育以培養「多面手的勞動者」爲目的。

劉派亦主張「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科學知識、有技術、有實際操作能力的新型勞動者」，但是認爲「普通勞動者，是講一種態度、一種作風；不是真的讓大學畢業生去當普通勞動者」；而且主張「重點學校」都有

自己的獨立的培養目標，例如偽清華大學要培養「紅色工程師」、中國醫科大學要培養教授、景山學校要培養「縣委書記、宣傳部長、婦聯主任」等幹部。一般半工半讀學校則培養有技術的工人和農民。（註二一）因此，其與毛派之主張，實際上是一偏于專才教育，一偏于通才教育。

六 教育制度的分歧

匪黨中央四十七年召集的教育工作會議，對於教育制度有兩項決議：

第一，統一性與多樣性相結合。培養目標是統一的，即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但中央、地方、與廠礦、企業、農業合作社都可以辦學，學校的形式應該允許多種多樣。學校可以是全日制的、半工半讀的、或者業餘學習的，可以是免費的或者是收費的。現在的業餘學校，在生產更加發展，工作時間可以縮短的情況下，將變為同半工半讀的學校一樣。在生產大大發展，公共積累大大增加的情況下，收費的學校也將變為免費的學校。

第二，普及與提高相結合，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一部份全日制的、半工半讀的和業餘的學校擔任提高的任務，同時用半工半讀和業餘學習的形式廣泛地普及教育。這種用來普及教育的學校，因為是半工半讀的和業餘的，可以全部或大部解決自己的經費，可以按照「能者為師」的原則就地找到師資，逐漸發展成為在課程、設備、師資等方面日益完備的學校。（註二二）

在「教育工作會議」中決定的教育方針，共匪特別強調是毛酋親自主持制定的，那麼這個會議所決定的教育制度，應該也代表着毛酋的主張，最低限度也包括着毛酋的意見。

五十三年五月，劉匪少奇提出「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教育綱領，這個綱領的實質和精神，大致是符合上項「教育工作會議」關於教育制度的決議的。劉匪少奇說：「我們國家應該有兩種主要的學校教育制度」，一種是現在的全日制制的學校教育制度，小學、中學、大學，整天都是讀書，這種學校由「國家」辦，質量要求高，「大概要搞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另一種是半工半讀的學校教育制度，這種學校有經濟目的，個人和「

國家」都有經濟目的。因為第一類學校吸收不了這麼多學生，家庭也供不起，自己又考不取，因此就不靠家庭、不靠「國家」，自己作工讀書，優秀的考上第一類，次一些的就進入第二類。（註二三）

陸匪定一也主張「雙軌制」，提倡「兩條腿走路」，把學校分為普及和提高的兩類，一類培養「專門家」，一類培養「勞動者」。（註二四）此外，鄧匪小平、彭匪真都主張「雙軌制」、保持「全日制」。五十五年鄧匪小平在匪黨中央書記處聽取蔣匪南翔關於高等學校半工半讀會議的匯報時，就規定「北大還是全日制」，並認為「不一定要求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讓另一條腿（指半工半讀和業餘學校）達到全日制一樣的人數，不要勉強。」彭匪真則強調地說：「原子彈爆炸還得靠全日制。」（註二五）

但是，毛酋却推翻匪黨中央關於教育制度的決議，主張採取「單軌制」，把全日制學校全部改為半工半讀學校，並且以當年訓練班性質的「抗日大軍」為標準。毛派指責劉派的「兩種教育制度」，是資本主義教育的「雙軌制」的翻版，是修正主義的教育綱領。其實，就匪黨中央關於教育制度的決議來說，毛酋所主張的「單軌制」正是「修正主義」的貨色。

七 教材教法的分歧

毛匪澤東認為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但是，他却指書本知識只是前人總結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學生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學生必須善于將這些知識應用到生活和實際中去。（註二六）足見毛酋偏重感性知識，流於經驗主義。而劉派則指出：勞動多，讀書少，教學質量就會降低；因而在五十年的「文科教材會議」上，制定新的教學方案，減少勞動時間，提出「三基」（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四性」（科學性、邏輯性、系統性、完整性）的口號，以加強書本知識的教學。（註二七）同時，劉派認為學校的政治教育是「思而不學、議而不學、論而不學」，「把文以載道發展到道以代文」，「把語文教材搞成了政治課教材」，（註二八）既多且偏，應該減少並糾正偏差。

在教材數量上、教學內容上，毛匪澤東主張「少而精」，目前已少到僅僅教學毛澤東著作了。而劉派則主張廣博、主張學貫古今中外；認為「古今中外的方法，就是全面的歷史的觀點。只有今，沒有古，就沒有歷史觀點；只有中，沒有外，就沒有全面觀點。」應該到「孔家店後院的倉庫」、「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櫥窗」、以及「彼得大帝時代俄國的翻譯館」去求知，把「古今中外，熔于一爐」。因而「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列有二百七十三個項目，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所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遺產的選本和參考資料」。(註二九)但是，劉派對於把毛澤東著作列為基本課程和基本教材，却不表同意，認為「毛主席語錄可以學，但不要占過多的時間」，「不要摘引毛主席的話，就當課本上的話說」。同時並指「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學術研究、編寫教材是『貼標籤』，同『義和團』唸一個咒，就刀槍不入一樣。」陸匪定一為此曾經講了一個故事，他說：「有個外國人打乒乓球，最後輸得不得了，想翻回來，就在頭上紮了一塊頭巾，裏面包了一個菩薩，希望菩薩保佑他。現在把這個菩薩換成馬克思行不行？這不是迷信嗎？它救不了你的。」陸匪定一不僅不隱諱自己反對「貼標籤」，而且主張「應該訂些規矩，不許那麼樣子貼標籤」，包括「一種新標籤——毛澤東思想」在內。(註三〇)因為「貼標籤」足以使教材內容簡單化、公式化，使學生思想僵化。

在教學方法方面，毛曾在十八年十二月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即曾提出所謂「教授法」十項：

- ① 啓發式(廢止注入式)；
- ② 由近及遠；
- ③ 由淺入深；
- ④ 說話通俗化(新名詞要釋俗)；
- ⑤ 說話要明白；
- ⑥ 說話要有趣味；
- ⑦ 以姿勢助說話；
- ⑧ 後次復習前次的概念；
- ⑨ 要提綱；
- ⑩ 幹部班要用討論式。(註三一)

毛劉兩派在教育路線上的分歧

最近毛派則強調要提倡啓發式，以自學為主。至於劉派因注重書本知識，比較偏重於注入式教學法，但是他們也注重「因材施教」、「個性發展」，以及「自由探討」。例如僑南京大學校長匡匡明曾對該校中文系某教師說：「你們要入黨幹什麼？……還是你們黨外人士好，多麼舒服！多麼自由！」言下似對「自由研究」頗為嚮往。

八 結語

(一)毛劉鬥爭的性質，既是思想鬥爭，也是權力鬥爭。思想鬥爭必須落實到政策路線的爭執，才會發展到權力鬥爭。匪黨內部雖然長期存在着策略路線之爭，但是在毛劉鬥爭中，策略路線的爭執却使思想鬥爭和權力鬥爭合二為一，使雙方的鬥爭更趨于複雜化和白熱化。其在教育路線上的分歧，因涉及階級鬥爭的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實已成為鬥爭的焦點之一。

(二)毛派一再指責劉派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長期竊踞文教界領導職位」；最近並指劉匪少奇會「採取組織措施，成立一個由自己掛帥的『教育辦公室』」，「還企圖自成系統，要各級相應建立『第二教育部』、『第二教育廳』、『第二教育局』。這個中國的黑魯曉夫赤膊上陣，周遊全國十幾個省市，作了二十多個報告。一年之內，由教育部、高教部、農業部、衛生部分別出面，召開五次全國性會議。他的一羣狐羣狗黨如彭真、陸定一、蔣南翔之流，更是四出奔波，揚言要使『兩種教育制度』這個『發明』家喻戶曉。中國的黑魯曉夫在大樹自己威信的同時，凶相畢露，放肆地把矛頭指向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叫囂：『就是要造成一個形勢，將他們的軍』；『你當權，我也可以當權』。(註三二)足見毛劉兩派在教育領域內的鬥爭，早已由路線之爭進入權力之爭。

(三)毛派指責劉派說：「在陸定一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統治下，不僅學習年限長，而且學校課程繁多，教學內容龐雜，教學方法採用注入式，同時存在大量的形式主義和煩瑣哲學；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等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那一套，幾乎全被陸定一一伙接受了下來。」而劉匪少奇則指「抗大式的學校是『訓練班性質』，『不算正規的大學』」，「甚至攻擊毛主席親手制訂的抗大辦學方針『過時了』

，「必須加以拋棄」。(註三三)兩派的互控，真是針鋒相對，其實問題很簡單，焦點是雙方在教育制度上有基本的分歧，那就是劉匪少奇主張「正規化」和「制度化」，而毛匪澤東則喜歡「農村作風」和「游擊習氣」。據說僞「江西省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幹部和教師認為「在共大工作是低人一等，不安心工作」；僞「新疆塔里木農墾大學」的學生說他們自己是「106幹部」(1是扁担一根，0是笠帽一頂，7是坎土鏟一把，9是糞瓢一只)、「塔里木水平」(塔里木是盆地，意思是低水平)；認為他們的學校「不正規」、「不像樣」，不知道「憑什麼叫大學？是個子大還是年齡大？」而社會人士對這類抗大式的學校也不重視、不支持。(註三四)顯然大陸上的師生以及社會人士，對於毛酋的「農村作風」和「游擊習氣」並不欣賞，並不響應。

(四)毛派指責劉派接受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那一套」，並作為三大「罪證」。其實毛酋自己對於外國文化以及中國古代文化，亦會一度表示要吸收和接受的，例如他在「論聯合政府」中說：「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蘇聯所創造的新文化，應當成為我們建設人民文化的範例。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文化」。如今毛酋政策更易，出爾反爾，排外非古，全盤否定，且竟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豈能令人心服？特別是在「一邊倒」時期，毛酋會強調「以俄為師」，大量譯蘇俄教材(截至四十六年底，匪區出版之蘇俄高等學校教科書譯本即有一千三百九十三種之多)，而今日匪俄交惡，毛黑反目，却又將「學習蘇聯」、「以莫斯科大學為藍本」列為劉派之「罪狀」，其轉嫁罪責手段之陰毒橫暴，實莫此為甚，因而劉派要起而與之作生死存亡的鬥爭。

(五)毛劉兩派的教育路線的分歧，本屬內部矛盾的性質，但是毛派却指劉派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資本主義教育路線，目的顯在強調彼此的分歧，擴大彼此的矛盾，並進而化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以便將劉派鬥倒、鬥垮、鬥臭！

註一、五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共匪「人民日報」，七月十八、二十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二、五十六年八月六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三、同註二。註四、同註二。註五、同註二。註六、原載共匪「武漢紅衛兵造反司令部駐穗聯絡站」編印之「陶鑄就是內南地區的黑魯曉夫」小冊第三、十部份；據五十六年三月二十四、二十九日「星島日報」轉引。註七、引自陸匪定一作「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見共匪「紅旗」雜誌四十七年第七期。註八、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九、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一〇、五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一一、五十五年十二月七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一二、見「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共匪人民教育出版社四十七年第一版)第四五頁。註一三、五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一四、同註一二，第六七頁。註一五、同註七。按陸匪定一雖已被指為反毛份子，但其當時所作之「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據「紅旗」編輯部按語謂，係根據匪黨中央召集的教育工作會議的結論寫出的。因此其主要論點是代表毛派意見。註一六、同註二。註一七、同註一〇。註一八、同註九，及一三。註一九、同註八。註二〇、同註二，及一三。註二一、五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五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二二、同註七。註二三、五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二四、同註一〇。註二五、原載共匪「八二五戰報」，據五十六年七月一日「星島日報」轉引。註二六、同註一二，第一三一至一三二頁。註二七、五十五年七月十七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二八、五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二九、同註二八。註三〇、五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八月十一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三一、同註一二，第一六五頁。註三二、五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三三、同註一〇，及三二。註三四、五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五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十月十六日共匪「人民日報」；五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共匪「光明日報」。

x
x
x
x
x